

# 储蓄率高企里的民生焦虑与投资无奈

董吉伟德 职员

13日,有关“我国人民币存款突破百万亿”、“中国人均存款77623元”的消息受到广泛关注。不少市民惊呼自己“拖了后腿”。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根据记者的测算,以全国人口总数13.5亿计算,截至今年5月底,中国人均存款为32719元。(7月14日《北京青年报》)

不管是人均存款77623元,还是人均存款为32719元,按照前任证监会主席的郭树清的话说,“中国的储蓄率高达52%,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而且就大国经济而言历史上不曾有过先例。”事实上,对于储蓄率的解读,传递出生存和发展的多重信号。要知道,存款数的增加,储蓄率的增长背后,是银行负利率和物价飞快上涨的生

动现实,在存款就意味着货币贬值和缩水的语境下,公众的存款热情依然不减,其背后的民生焦虑与投资无奈,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对于储蓄率高企,一个基本共识是,在社会保障不力的情况下,民众过多承担公共责任之后,“手中有钱,心中不慌”让民众有钱不敢花,存钱以备不时之需便成了首选。事实上也是如此,当看病、入学、养老和住房成为数座大山之后,谁也不敢轻易消费,更难言超前消费。拼命存钱的潜台词是拼命挣钱,高涨的物价让普通人根本无法停止下来,当十年前还可以寄望于10万元养老,而今天可能一场病就会花去所有的积蓄的情况下,他们就会在生活的重负之下,为自己的明天寻找一种保障。

这些年来福利制度没有跟上经济发展

的步伐,民众为生老病死等基本人权尊严成本也在不断增加。存款数的增加,并非代表他们真正的财富增加,相反却是物价上涨,成本增加的直观反映。同时,国内的储蓄率虽然很高,但平均到每个人的身上其实并不多,在数量之下的结构失衡,以及贫富差距的悬殊,更要看到,时下还有1.28亿人处于贫困线以下,约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这些因素同样不可小视。

而另一个原因便是,投资渠道的短缺,经济结构的单一,使得民众只好退而求其次将钱放在银行。股市的风险,楼市的泡沫,炒作的风险,民间借贷的混乱,使得民间资金根本没有保值增值的安全通道,正是投资渠道的匮乏,将钱存入银行便成了民众最无奈的选择。一度以来,炒期货,购黄金,买基金以及“全民炒房”都热热闹闹,

但潜在的风险也越来越大,股市惨淡经营,楼市泡沫高涨,民间借贷更是刀光血影,对于经不起折腾,也无法折腾的人来说,他们只能把自己的钱借给银行,让银行贷出去后继续让自己亏损。尽管银行不可爱还恨可恨,那种不得不爱的感受便成了民生的真实写照。

对于不理解民众何以不消费的专家们来说,他们恐怕难以读出民众的纠结与无奈,其间的民生酸楚,也只有普通人自己懂得。从某种意义上,存款数越多越表明民众面临的压力越大,当没有出路和保障的情况下,他们只有寄望于用存款的数量,证明自身的存在,并给自己带来前进的希望。储蓄率高企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效应,其涵盖的不止于观念问题,也不是简单的经济命题,更是一个社会与民生考题。



## “干部进民企促发展”值得称道

侯文学 职员

今年5月29日,重庆市启动了“干部进民企促发展”活动。经过自己报名和组织筛选,已有40名优秀年轻干部到40家民营企业挂职,涉及制造业、房地产、医药、餐饮、金融、传媒、科技等16个行业,其中18人任副总裁、副总经理,18人任总经理助理,4人任部门负责人。(见2013年7月18日《中国新闻网》)

重庆市的这一做法所以值得称道,关键在于这些干部下到企业后能够很快地转变角色,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帮助企业开拓经营。如,重庆市商委餐饮住宿业处副处长冯涛挂职任重庆知名餐饮企业陶然居集团董事长助理,他未发现一家企业的木瓜酒品质不错但销路不广,就

帮助其进入陶然居销售。市卫生局医政处副处长向准挂职任山外山科技集团副总,推动企业在北部新区第二人民医院内建起了血液透析中心。由于干部真心实意地帮助企业,很多企业老板主动致电要求派干部下到自己的企业。

“干部进民企促发展”活动,架起了民企与政府沟通的桥梁。过去,有些民企在生产经营中遇到实际问题找到政府相关部门时,由于政府工作人员对民企情况了解不够,企业主对一些政策也不熟悉,问题解决起来并不顺畅,企业主因此对政府产生了一些误解。干部进企业后,企业进一步了解了政府意图和相关政策,与政府部门沟通也更方便了,这就增加了他们对政府的信赖感,心里更加踏实了。

“干部进民企促发展”活动,还有利

于培养干部。过去,干部经常到国有企业和农村挂职锻炼,如今去民营企业的生产一线支持经济发展,了解民营企业发展之难,同样能够使干部在实践中增长知识和才干,得到锻炼和提高。而且,民营企业主既是老板,也是普通百姓,这实际上也是在深入群众、密切联系群众,有利于强化干部执政为民的理念和群众观念。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国家扶持民营经济政策的落实,我国民营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如今已经占据半壁江山。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离不开民营经济的充分发展。重庆是民营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民营企业数量仅次于广东和浙江,在全国位居第三位。他们开展的“干部进民企促发展”活动,应该对其他地区有所启发。

## 药品购销须源头治腐

木须虫 职员

公安部披露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GSK中国)部分高管被查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据了解,GSK中国此次共有4名高管被抓。外资药企的“四驾马车”同时被抓,这还是首次。这些高管涉嫌受贿,并用受贿所得再行贿赂政府官员和医生等,其中还有人涉嫌接受性贿赂。(7月15日《京华时报》)

GSK案的手段并不高明,可以说是药品领域通行的规则,他们通过旅行社以会议的名义,组织专家医生旅游等进行贿赂,并且通过旅行社套取部分资金,再单独向特定具有关键作用的官员和医生行贿,达到巩固药品销售的目的。GSK之所以如此,不过是规避本公司内部的监管罢了。相比较来说,国内的药企或者药品经销机构内部监管就软弱得多,行贿起来也要便捷许多。比如,2011年浙江省卫生厅开展专项整治活动,仅半年来医务人员已主动上交回扣款、礼卡、礼券、礼品等约1800余万元,而在整顿同期还曝出“温州百名医生吃药厂回扣”的新闻。

GSK案发后,整个医药行业人心惶惶,担心突然哪天警方就找到了自己头上,并不是虚言。当然,打击只能解决或然性的个案,仅具震慑作用,并无助于改良必然性的行业土壤。在药品购销领域,不管是GSK依托旅行社的会议模式,还是所谓的“医药代表”、“专业贿赂公司”实质是利益的代表,都是附着在药品虚高利益分配的执行人。换言之,药品因无序竞争,变成了瓜分利益蛋糕的工具,高价格的张力才能牵起利益链条的整体诉求。

GSK案是药品购销领域问题的缩影,

如GSK运营总经理梁宏归案后的反思:一种药品要上市,要与各个部门打交道,如注册涉及药监部门,价格涉及发改委,进医保涉及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进入地方涉及地方招标办,进入医院要涉及医院院长,科室主任、医生等,“环节太多,要交道的政府部门太多”;目前中国的药厂太多,都是一种低水平的仿制,这就导致不能集中优势进行研发。而像美国,只有几家大型药企,动辄就可以拿出数亿元进行研发,“研发的成本就高”。

梳理一下梁宏的反思,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行政监管的手过长,缺少有效的市场机制;二是以药养医模式的依赖;三是药品生产方向的偏离,药企多研发的少,低端重复必然导致仿制药品泛滥。如有资料显示,美国FDA每年新批药号不过几千种,而我国新药号批准曾一度达到过万之多,药品泛滥自然会跌入恶性竞争的怪圈。这些问题并不陌生,在诸如“天价药”、“天价药单”、“药品降价死”之类现象的讨论中,都曾反复剖析过。可见,是畸型的土壤催生商业贿赂“妖艳”的奇葩。

商业贿赂要打击,虚高药价也要降,但都只治标不治本,着眼于长远,逐步改良药品产销的土壤,培育和修复健康的市场机制,才能实现源头治腐。一是对药品过多过滥的现象,应按品种进行清理与压缩,建立退市机制;二是从根本上推进医疗体制改革,让医疗回归到“以技养医”的模式上来,有序开放药品市场竞争供应,切勿掉管控环节虚高的利益;三是转变药品生产的导向,通过有效的价格机制和管理机制,将药企导向研发为主,靠技术创新的轨道。此外,加大惩治力度,建立药企商业贿赂黑名单制度,加大违法成本,倒逼行业自律。

## 为实体书店减免税赋早该落实

耿银平 教师

7月15日多家媒体报道,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正与有关方面协调沟通,希望借鉴欧美等国家对于实体书店的低税率或者零税率做法,将于近期制定对我国实体书店减免税赋的政策法规。

近年来,民营书店倒闭的消息不绝于耳。从2007年至2009年,我国仅民营实体书店就减少了1万家。虽然这种不景气与经营、读书氛围不浓有关,恐怕与网购时代,实体书店成本过高、利润微薄,入不敷出,关系密切。

数据显示,实体书店目前的税收状况是:提取营业总额的8%上缴营业税,提取营业总额的13%为增值税,再按增值税额的7%提取城建税,3%教育附加税,20%地方教育税,还有占利润总额25%的企业所得税。书店平均毛利不会超过17%,绝大部分民营实体书店根本已无净利润。如果再加上行政管理费、房租,员工工资等,真可谓“赔本赚吆喝”了。在这种两难情况下,想让实体书店和新华书店一样,承担起重要的文化反哺和传播责任,就有点不近人情了,因为新华书店作为文化改制试点单位,“可免征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及房产税等6大税种,县级及县级以上书店亦可免收增值税”。

仅仅口头上纠正实体书店的倒闭倾向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为他们的生存发展,提供实事求是、行之有效的制度帮助。为实体书店减免税赋,就包含了这种“制度好心”,减少捆绑在实体书店身

上的高成本负担,让实体书店和新华书店一样,轻松上阵,平等竞争,得到充分的财政支持,其自由发展活力就能得到激活。经营者尝到了利润的甜头,才愿意为书香琴韵的打造,做出积极贡献。

在整个社会对文化发展、精神发展日益重视的当下,我们更应该站在开明的高度,认识实体书店,他们不仅是个体经营者,更是毋庸置疑的民间文化大使;不仅是一般的就业人员,更是社会文化发展“书香中国”的积极推动者。我们能为公益性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提供免费开放、财政支持,对实体书店免费,也契合这种公共文化理念。

社会越发达,公众对公共文化、精神发展质量就越重视,这种重视主要通过各种公共文化支出,为公众提供更多公益性、公共性文化场所和社会氛围,因为很多人仍然喜欢“去书店买书”。为实体书店减免税赋,也是一种无意的公共文

化反哺,是公共文化服务系统的必要的公共责任的担当。

“发达国家如法国政府,长期免征书店所得税的政策,保证了大小书店的良好运营。”我们为实体书店减免税,也是在国际接轨。

当然,实体书店摆脱困境,仅仅免税是不够的。其一,经营者应该积极创新,将香港的生活化经营融入书店经营模式,让书店也充满生活韵味,提高人们购书的积极性。其二,面对网络书店的恶性竞争,政府还应将《图书公平交易规则》落实到位。倡导良性竞争,认真落实“新书一年内不得打折”的规定。让实体书店,走出困境,走向繁荣;走出疲软,走向振兴!



## 鼓吹房价无限上涨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钱兆成 媒体人

房地产业无疑成了老百姓最关注的行业,房价的一涨一跌,都牵动着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心。近日,房地产“大佬”任志强面对上千万的微博粉丝,不断在微博上宣扬他的“房价永恒上涨论”,而这也使得他不断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7月13日《中国经济网》)

笔者认为城市化是房价上涨的主要原因。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只有36%左右,农村人口占54.3%,城市化进程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还将继续呈加速态势。按目前年均1.12%的城市化速度估算,每年平均有近1500万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如果城市化水平提高到70%,城市就要增加4亿人口。不断扩大大的购房队伍与城市有限的土地供应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房价不断上涨,这是由价值规律决定的必然趋势,也是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

然而,地产商鼓吹房价无限上涨论

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一者,无限上涨论不利于合理引导企业理性投资和居民理性购房,一部分民众容易被这种言论牵着鼻子走。而房地产开发商是房地产市场的利益主体,是高房价最为直接的受益者。在高房价形成的需求不足供给过剩的假象掩盖下,一些房产开发商在利益驱动下,结成价格联盟,哄抬房地产价格,形成所谓的炒房团,扭曲民众需求,造成住房供不应求的假象,从而攫取暴利。中国的房地产定价已不再是简单的成本费用定价、商品价值定价和市场定价,而是包含了强烈的人为因素。

二,相应的,政府应该整治房地产市场秩序。加大房地产市场秩序专项整治力度,重点查处房地产开发、交易、中介服务中的各种违法违规行,防止开发商利用政策、市场信息不对称与不透明,通过交易、虚假宣传等不正当手段,谎报商品房销售进度、发布不实价格信息、哄抬房价、误导市场预期行

为。

三,应该肯定一点,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调控绝不是打压房地产,更不是要让房地产出现大起大落,而是希望其能保持平稳、持续、健康的发展,拉动经济发展。

许多地方政府仅关注房地产市场对当地经济增长的贡献,而忽视了住房的社会保障功能,这是给房价以上涨空间的另一个原因。商品房与廉租房二者本末倒置是房价持续上涨的重要原因,政府应进一步扩大廉租房的覆盖面。政府应积极借鉴香港公屋经验,加大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力度。对不符合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供应条件,又无力购买普通商品住房的家庭,应从实际出发,大力发展租赁住房方式,这也是目前国际上国家解决住房问题的通行做法。

给房地产市场降温,挤出房地产中的泡沫是当务之急,毕竟房子问题不是一间房子那么简单了,而已经涉及到分配层面了。

## “防涝大纲”尚须“刚性问责”

张西流 公务员

日前,住建部印发了《城市排水(雨水)防涝综合规划编制大纲》,对城市排水防涝的规划目标作出硬性要求,即发生城市雨水管网设计标准以内的降雨时,地面不应有明显积水;发生城市内涝防治标准以内的降雨时,城市不能出现内涝灾害;发生超过城市内涝防治标准的降雨时,城市运转基本正常,不得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7月13日《新京报》)

当一些城市身陷内涝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城市防涝大纲”终于浮出了水面。尽管颇具“亡羊补牢”的意味,但用“大纲”去规范过去杂乱无章的城市防涝体系,为时未晚。然而,虽然称之为“大纲”,但“刚性”并不强,需要配套措施和问责机制强力跟进。比如“城市内涝不得有人员伤亡”只限拿市长及有关部门负责人的乌纱帽做保障,以此倒逼城市穷尽所能抓防涝治水患。

近年来,城市因暴雨发生严重内涝的情况时有发生。广州、南京、武汉……,以往鲜亮的城市,在瞬间变成“水城”。特别是,3月22日,长沙突降暴雨,城内多处一片汪洋,21岁的女孩杨丽君不慎落入下水道,随即被急流卷走。然而,“逢暴必淹”不仅是南方城市的“专利”。北京等北方城市,也出现了“路人在街面上游泳、司机在车中溺水”的另类奇观。由此暴露出,一些看似“现代化”的城市,在排水系统的规划设计、建设管理、防范制度和应急措施等方面严重滞后。

“大纲”规定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中心城区能有效应对不低于50年一遇的暴雨,但现实情况却是,一些城市别说是遭受50年未遇的暴雨,哪怕是10年不遇、甚至是5年一遇,城市排水系统,也未必能够经受得住洗礼。反观国外,欧美排水系统设计标准为“100年甚至300年一遇”,法国巴黎对下水道排水能力建立有完善

的实时监控体系,即使在地处沙漠的沙特的一些城市,在排水系统的设计施工中也不断心存侥幸,以致可以应对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

一些城市在暴雨面前不堪一击,除了城市排涝系统“先天不足”,以及在防范和应急上“后天缺位”之外,近年来盛行的城市开发,崇尚大拆大建、填湖削山,也是罪魁祸首之一。许多城市的内河道、湖泊水塘、地下水脉因此被填堵阻隔,一旦遇到暴雨灾害,原有自然水道无法畅通运行,只能依赖于脆弱的现代排水系统,涌堵内涝每年都会发生。因此,在城市建设中,不能只考虑经济增长,还要兼顾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利用好自然水系,发挥湖泊河道的蓄水调节功能,减少人工的过度开发破坏。这样才能以人为本,趋利避害,造福于民。

更重要的是,现代城市若想终结“逢暴必淹”困境,必须在城市排水系统的规划设计、建设管理等方面进行检讨与反思,并要花大力气对“先天不足”的排涝设施进行整改,尽早扭转“弱不禁风”的尴尬局面。同时,不妨从现在开始,由政府部门对各积水点在暴雨中的积水数据进行统计,以摸清情况做排水改善,防“水患于未然”。特别是,应针对“城市防涝大纲”,制订配套细则,并实行刚性考核;对防涝治水不力者,进行刚性问责。

